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世纪中国禁毒史

〔美〕周永明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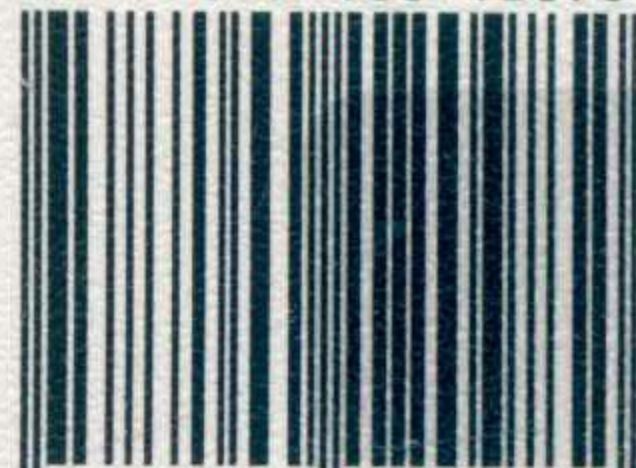
本书是海外最早研究20世纪中国禁毒运动的专著，在历史和毒品研究领域颇具影响。著者通过将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的议题带入禁毒研究，阐释现代中国禁毒运动的复杂性。著者指出，在现代中国，毒品问题不仅被看成是一种社会越轨行为，而且与鸦片战争的历史、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国家认同建构都紧密相连。



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2098-2



9 787100 120982 >

定价：22.00 元

20世纪中国禁毒史

民族主义、历史和国家建构

〔美〕周永明 著

石 琳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禁毒史 / (美)周永明著;石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098 - 2

I. ①2… II. ①周… ②石… III. ①禁毒—历史—
中国—20 世纪 IV. ①D66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429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20 世纪中国禁毒史

——民族主义、历史和国家建构

〔美〕周永明 著

石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098 - 2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22.00 元

Zhou Yongming

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opyright © 1999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6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年英文版译出

献给

岚、子琳、子樱

目 录

致 谢1

1 前言4

2 晚清的民族主义、改革和反鸦片动员19

3 民族主义与上海精英的禁毒动员
(1924—1927)56

4 社会与国家：拒毒会与国民党的鸦片政策
(1927—1934)88

5 六年禁烟计划和新生活运动111

6 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与政权建设：人民共和国的
禁毒运动 (1949—1952)135

7 毒品回潮：当代中国的禁毒话语160

8 没有人民的“人民战争”：20世纪90年
代的禁毒运动185

9 禁毒运动与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207

10 结论226

参考书目232

索引243

表目录

表 2—1 : 外国鸦片进入中国, 1819—1839 年	22
表 2—2 : 合法销往中国的外国鸦片, 1867—1908 年	41
表 5—1 : 七省根除罂粟种植时间表	118
表 5—2 : 二十一军的鸦片收入	128
表 6—1 : 南京被捕涉毒人员判刑情况, 1952 年	141
表 6—2 : 主要行政区发现的涉毒人员数目, 1952 年	144
表 6—3 : 主要地区被捕和执行死刑人数	155
表 7—1 : 不同组别的阳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例, 1985—1990 年	170
表 7—2 : 不同地区的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1985—1990 年	171
表 8—1 : 德宏和保山枪决的毒贩人数	188
表 8—2 : 中国登记在案的吸毒者人数, 1990—1998 年	203
表 9—1 : 茂县、汶川、理县和松潘的瘾君子与贩毒的 人数, 1950—1952 年	223

致 谢

xi

准备、调研和写作本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个人和机构的帮助。首先，我诚挚地感谢 Richard G. Fox 教授，他的指导和鼓励在这项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同时，我深切地感激 Arif Dirlik 教授。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在这些年中，他总是有求必应，为我挪出时间。这项研究从他的批判性意见中获益匪浅。

我最深的感激同样也要献给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其他成员：Judith Farquhar 教授、Orin Starn 教授、Claudia Strauss 教授以及 Ralph Litzinger 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Farquhar 教授总是我寻求帮助和建议时想到的第一人。Starn 教授在这么多年中始终是一位充满关怀、理解以及洞察力的导师，他每每像及时雨般给我鼓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我同样感激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这个

名单实在太长，不能在此一一罗列。我特别要对云南大学的林超民教授和北京医科大学的马模贞教授道谢，感谢他们给予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满怀感恩之心地在此特别提到加州大学厄湾校区的王国斌教授，感谢他阅读本书初稿并提出富有洞见的评论。

这项研究在各个阶段，得到了许多机构提供的资助，其中包括杜克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及亚洲太平洋研究奖学金。杜克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暑期研究经费令我能够于 1992 年——即这项研究刚刚起步阶段，回到中国从事初步的调查。美学术交流委员会、温纳-格伦人类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以及《中国时报》文化基金青年学者奖金支持了我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华盛顿中国研究中心和孙逸仙学术基金会提供了额外的经费支持。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对论文写作提供了部分资助。此外，来自胡佛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旅行经费支持了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文献研究。

我同样要感激那些热心帮忙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他们分别隶属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杜克大学图书馆、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我还要感谢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工作人员。

在此还要向编辑 Susan McEachern 女士以及文字编辑 Kathleen Silloway 女士致谢，感谢她们在我向 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投稿和进行文字编辑时给予的帮助。我还希望借此机会感谢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十张照片。同时感谢南京大学的朱庆葆教授为我提供其余的图片。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庭。我的女儿子琳出生于论文写作期间。她的出生带来的喜悦给予我完成此书以决定性的鼓舞。妻子邵岚以她的耐心、理解和编辑手稿的娴熟技巧支持我完成了这个研究项目。我以满腔的爱和感激将这本书献给她们。

1 前言

1992年6月26日，在海洛因滥用问题最为严峻的云南，超过400人在省会昆明的体育场举行禁毒集会，并公开审判了一批毒贩，其中21人被处以死刑。宣判后他们立刻被带到刑场，由行刑队执行。省长在集会演讲中，表达了政府打击毒品的决心。其后，4000公斤海洛因和鸦片被分别投入位于体育场一角的60只巨型电锅，当众焚毁。焚烧的火焰在热烈鼓掌欢呼的观众面前升腾近10米高。体育场内情绪高昂，达到顶点。同一天，在虎门举行的禁烟集会也公开焚烧了160公斤海洛因、鸦片和大麻。虎门是毗邻广州的一个小城，1839年林则徐曾经在此销毁成千上万磅没收的英国鸦片。在集会上，31名广东毒贩被判处死刑，其中18人被立即执行。

以上只是近年来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的禁毒运动中的两个场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的6月26日，中国都

会举行公开的禁毒审判和集会。这一天是国际禁毒日，同时也被定为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的周年纪念日。禁毒集会举办的时间还有地点，都精心取材于它们各自拥有的符号意义。进一步回眸历史，禁毒集会和公开焚毁收缴来的毒品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数不胜数，已经成为中国禁毒运动的一种仪式。1839年的虎门销烟是这个仪式的原型，并被再三复述、诠释、举行和影像化地呈现到大众面前。举例来说，1997年发行的电影《鸦片战争》就重现了这个历史事件。这个影片被用来纪念香港回 2 归。历史上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结果之一，香港被割让和“租借”给英国。影片以非同凡响的恢宏场景呈现焚毁鸦片，成为片中最富感染力的场景之一。



以上这些公开的禁毒“表演”涉及多个议题：政治仪式、国家暴力、民族主义话语、历史叙述和情感动员都在其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使得这些“表演”尤其引人注目。然而自第一次鸦

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年间，除了共产党执政的二十年间，毒品问题一直纠缠着中国。在近现代中国禁拒鸦片和其他毒品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议题。自 20 世纪伊始，禁毒话语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共识，有关禁毒的法律规章的数量和力度都在增加，同时国家也通过引导全国性的禁毒运动切实参与其中。但是毒品滥用的问题愈演愈烈，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毒品与近现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纠缠颇深，但这个重要的现象迄今还没有被充分地加以研究。^[1]

在 20 世纪的背景中，通过将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的议题带入毒品研究，阐释现代中国禁毒运动的复杂性，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我将展示，是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的需求形塑了禁毒运动的展开方式。在近现代中国，毒品问题不仅仅被看成是一种社会越轨行为，而且是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对国家历史和身份的定义都紧密相连的爆发力极强的议题。可以说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所有的禁毒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禁毒运动也与近现代中国的国内政治紧密相关。随着清朝的覆亡，中国见证了北方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权力交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利用禁毒运动来建设、巩固和展示国家霸权。具体来说，禁毒运动包括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全国性动员以及对国家暴力的实施。本研究检验国家对民族主义的禁毒话语的

[1] 在本书中，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毒品”这个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主要指的是鸦片，80 年代后则是指海洛因。

多元诠释，及其如何将之囊括进国家开展禁毒运动的隐藏议程或幕后动机。民间领域（private sector）扮演的角色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也在这个背景中被加以探讨。本书将特别关注中华国民拒毒会，一个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中期特别活跃而有影响力的私人机构。



本书有关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的论点将通过探讨 20 世纪中国的数次禁毒运动来加以论证。除了无数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禁毒动议，自 1906 年以来，曾经有过四次全国性并得到国家支持的禁毒运动。第一次禁毒运动实施于清朝最后的日子，成效斐然，但随着 1911 年清政府的垮台而夭折。第二次发生在 1935 年到 1940 年，国民党人将之作为推进新生活运动的一项举措，谈不上成功。另两次禁毒运动都发生在 1949 年之后的中国。实施于 50 年代早期的那次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肃清了毒品问题，这是前

所未有的。到了 80 年代早期，吸毒和贩毒作为一个社会问题重新出现。并且自那时起，海洛因从东南亚经由中国内陆到香港、进而覆盖到世界海洛因主要消费地。中国已经成为海洛因走私的一个主要环节。为了应对毒品问题，中国政府在 80 年代末期开展了新的禁毒运动，但迄今效果未彰。

本书的分析围绕禁毒运动两个不可分的层面，即禁毒话语和禁毒行为。就禁毒话语这个层面，本书关注的议题包括民族主义、历史叙述以及禁毒宣传。而就禁毒行为，本书检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如何利用毒品问题以创造一个公共领域，并在其中实施它自身的影响力；同时也关注国家是如何试图利用禁毒运动来巩固其自身权力。通过将民族主义和霸权理论带入对毒品问题的研究，本书旨在（1）为这些运动建构起一个简明的文化史，（2）探讨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叙述以及民族主义如何使得毒品成为一个公共领域议题，并进一步被用来合法化这些禁毒运动，以及（3）凸显这些禁毒运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成为国家建构的一种方式。

本研究综合了档案文献研究、参与式观察以及话语分析。整个研究发萌于 1992 年夏天初步的田野调查期间，从 1993 年冬到 1995 年夏我在昆明、北京和南京做了档案研究，同期田野调查的工作主要在云南省进行；1994 年到 1995 年间，在保山市和德宏自治州进行参与式观察。因为本研究旨在描绘近现代中国禁毒运动的一张广阔画卷，我采取的方式是宏观的而非聚焦微观、历史性的而非以特定地域为视角，同时辅以具体的案例研究。毒品问题呼唤更为成熟深入的人类学研究，本研究旨在给这一领域

添砖加瓦。遗憾的是，在这个亚领域，到目前为止对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议题的关注还寥寥无几。

人类学和毒品研究

世界上对药物滥用已有很多研究。总体来说，这种滥用仅被看成是社会越轨的一种形式，而这种越轨会影响公共健康和安全。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视角之外，人类学家在酒精滥用的研究中引入了一种文化的视角（Everett, Waddell, and Heath, 197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毒品研究的人类学文献急剧增长，但是有几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首先，通常来说，毒品研究常常是主流人类学研究的“副产品”，相应的是，描述性的研究占大多数，仅仅局限在毒品历史的重建及其地区分布的记述（Marshall, 1987）。

第二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个问题的反面。将文化视角带入毒品研究常常将研究者领至一种“文化的误区”（fallacy of culture）（Fox, 1985）。当研究者着重描述表层的或“富有异域风情的”毒品习俗时，很多研究忽略了探究更广更深的意义。大多数人类学毒品研究的不完整性，追本溯源是对人类学核心概念——文化概念的误用。人类学的毒品研究通常将文化看成是自成系统的、静态的结构，而非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的总集；将之看成是一个有力的可以决定人们行为的单体，而不是一个各种活动被定义和协商的领域。就毒品研究来说，这种“文化学”（culturology）归根到底就是一套万能的解释。也就是说，